



工農聯盟是建成 共產主義的堅強基礎

格列爾·亞·著

新知識出版社

51
716
K1

521

361

5/4716

K.I

36205

工農聯盟是建成共產主義的 堅 強 基 礎

格 列 則 爾 曼 著

高耀琪 孫占通 譯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Доктор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Г. Е. ГЛЕЗЕРМАН
СОЮЗ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
МОГУЧАЯ ОСНОВА
ПОСТРОЕНИЯ КОММУНИЗ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 1954

根據蘇聯《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譯出

工農聯盟是建成共產主義的
堅強基礎

(蘇)格列則爾曼 著
高權琪 孫占通 譯

*

新知識出版社出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新0257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1/16 字數：32,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100本

定價：(06類) 0.17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分三個部分，作者首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論證了工農聯盟在對社會進行革命改造中的重大作用，進而全面分析了它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特點，最後並對進一步鞏固與加強工農聯盟的具體途徑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本書可供一般機關幹部和工廠、農村工作幹部學習參考。

目 錄

工農聯盟是社會的革命改造的決定力量·····	2
社會主義社會中工農聯盟的特點·····	18
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的途徑·····	27

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義國家生存與鞏固已經三十五年了。在我國國徽上，鐮刀和鐵錘交叉在日光照耀下的地球的背景上。這就是從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日起就成為蘇維埃制度基礎的牢不可破的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的象徵。

我國的工農聯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鍛鍊出來的。勞動人民為擺脫階級壓迫而進行了若干世紀的鬥爭，只有在工人階級——歷史上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領導下，以及在工人階級領導了千百萬農民羣衆的時候，才能獲得勝利。由於工人階級與農民團結了自己的力量，他們才能推翻陳舊的制度而建立新的、蘇維埃的制度，才能消滅剝削而把我國變成一個具有強大的工業和集體農業的強國，才能在與帝國主義豺狼進行鬥爭中保持其獨立。

偉大的列寧——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教導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持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工人階級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與國家政權。

黨把工農聯盟的問題當作自己的理論與政策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當階級還存在的時候是不能從日程上取消的。在列寧制訂的全部革命理論中，在關於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道路的理論中，都貫穿着以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為前提的工農聯盟的思想。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工農聯盟始終是我們制度的不可動搖的基礎，而關心這個聯盟的鞏固，則如以往一樣，乃

是我黨政策的指導原則。

共產黨經常不斷地鞏固工農聯盟，以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黨關心着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的最迅速的發展，關心着集體農莊的進一步鞏固，關心着為共同實現共產主義建設偉大綱領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物質福利與文化水平的一貫提高。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近幾次全體會議（一九五三年九月，一九五四年二月至三月與同年六月）的決議，確定了迅速提高農業的途徑。

實現黨所提出的農業高漲的全民任務，就會愈益鞏固作為蘇聯勝利建設共產主義的最重要條件的工農聯盟。

工農聯盟是社會的革命 改造的決定力量

工農聯盟的意義，首先在於它是改造社會、消滅陳舊的資本主義制度與過渡到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所必需的革命力量。

世界各國中，俄國首先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當資本主義在我國遭受到革命的衝擊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就已由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歷史發展提到日程上來了。所有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的發展，給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前提，並迫切地要求消滅陳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但是，單是一些物質前提還不足以解決歷史任務，即使這些物質前提已經完全成熟。要解決這些任務，還需要有能夠戰勝社會陳舊勢力反抗的革命力量。雖然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裏，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要

比俄國成熟得多，但是由於這些國家裏尚未形成這種革命力量，因而在那裏直到現在還保存着陳舊的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地，在俄國，當它在二十世紀開始成為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中點時，就有了這種革命力量，這就預定了我國資本主義的命運。這種力量，就是世界上最革命的俄國工人階級與俄國千百萬農民的聯盟。

早在一八九四年列寧在他的天才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就宣佈了建立作為通過革命首先推翻沙皇制度然後推翻資本主義的手段的工農聯盟的必要性。列寧在說明了工人階級這一俄國全體勞動人民與被剝削人民的唯一的、天然的代表的歷史作用以後，在結束他這本書時預言說：那時，“俄國工人就能統率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專制制度，並引導俄國無產階級（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並排）循着公開政治鬥爭的大道一直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①

列寧的工農聯盟思想的提出，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這一問題的原理的。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初，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的著作中曾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得到農民的合唱的支持，沒有這種支持，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幾年以後，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命運，將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它為轉移。

① 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211頁。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一般地表明了關於工農聯盟必要性的思想，而且在他們逝世以後，這種思想又被第二國際的首領們葬送了。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俄國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所有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都否認農民的革命可能性，對農民問題採取了輕視態度。他們以這樣的論調來偽裝自己，似乎他們是在捍衛純粹是工人的利益，而不是小資產階級農民的利益。但是實際上這裏面隱藏着背叛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爲。由於他們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不願意爲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因而他們就不去關心無產階級在這個鬥爭中的後備力量。正因爲如此，他們就對農民採取了輕視的態度。

與此相反，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始終極嚴肅地注意農民問題。正因爲我們的黨抱定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方針，所以它對爭取無產階級在這個鬥爭中的後備力量給予了最嚴肅的注意，而這種後備力量，就是勞動農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勞動者。這就決定了農民問題與民族問題在列寧主義中所佔的地位。列寧主義把農民問題看作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一部分。

歷史發展所創造的條件，使工農聯盟在俄國較其他國家更早地形成起來。在西方，當在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時期，農民作爲革命的力量曾參加了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在那個時期，無產階級尚未形成爲一個階級。由於這幾大革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因此農民從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而後來就成爲資產階級的後備軍。例如在十九世紀法國的幾次革命中，農民就是作爲這種後備軍參加革命的。說起來，無產階級在這幾次革命中遭到了失敗，其原因就是由於沒

有得到農民的支持。

在俄國的情況就不同了。在這裏資產階級革命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接近死亡的條件下發生的，是在無產階級已形成爲革命階級並有了自己的獨立政黨、而資產階級已成爲力圖與沙皇制度相勾結的反革命力量的條件下發生的。在這些條件下，資產階級革命只有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取得勝利，而農民也只有從無產階級手中才能取得土地。這樣，就真正可能使農民、它的被剝削的大多數由資產階級的後備軍變成爲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變成無產階級的同盟者。

爲了使這一可能成爲現實，就必須把農民從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下奪取過來，把它爭取到無產階級政黨這方面來。俄國三次革命的歷史，就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及其一切政黨——從立憲民主黨人到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爲爭取農民而鬥爭的歷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準備時期中（包括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在內），主要是代表自由資產階級利益的立憲民主黨人與布爾什維克（代表革命的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人）之間爲爭取農民而進行的鬥爭。農民越來越相信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的手裏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所以就逐漸擺脫掉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而轉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了。這個時期共產黨是在下面的口號下進行工作的：中立資產階級，與全體農民一起來反對專制制度，爭取民主革命。

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的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時期，主要是代表富農階級利益的社會革命黨人與布爾什維克之間爲爭取農民、爭取大多數農民而進行的鬥爭。這個時期的特點是：農民

進一步地革命化了，他們離開了社會革命黨人，並轉過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這一唯一的、革命到底的力量的周圍。十月革命前夕，在自命爲“農民”政黨的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共同執政的國家，農民暴動遽起，這個事實明顯地證實了社會革命黨人政治上的破產。社會革命黨人對暴動的農民進行了圍剿，完全證明他們已背叛了農民而轉到地主那方面去了。

在這個時期，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是：中立小資產階級，聯合貧農以及一般的半無產階層的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如果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展開反對專制制度與地主的鬥爭時，全體農民都能夠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的話，那末，在過渡到旨在反對資產階級（其中包括反對富農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時，無產階級首先能夠指望的就是貧農的支持。

因此，工農聯盟的內容隨着革命階段的更換，在歷史上也是有所變化的。但是，把廣大的農民羣衆吸引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並利用他們所具有的革命可能性，乃是在一切革命階段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

列寧主義摒棄了機會主義者腐朽的和反革命的方針，他們否認農民、它的被剝削的大多數的革命可能性，並斷言農民不能跟着無產階級走。列寧創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是從這一不可反駁的事實出發的：即資本不僅剝削無產者，同時也剝削千百萬城鄉半無產階層羣衆，因此，在無產階級爲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進行的鬥爭當中，他們可能並且應該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打倒資本不是由孤立的無產階級，而是由作爲領導者的無產階級領導自己的同盟者——城鄉半無產者羣衆，首先是大多數的

農民——來實現的。因此，按照列寧的意思，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中的領導權。

歷史完全證實了列寧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保證偉大的十月革命異常迅速並且比較容易地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俄國的無產階級當時有着佔農民人口極大多數的貧農這樣一個重大的同盟者的緣故。這一聯盟的存在，正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所指出的，就決定了中農底行為，他們會動搖過很久，直到十月起義前夜時才轉到革命方面來。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工人擺脫了資本主義的剝削，使勞動農民擺脫了地主的壓迫，使原先被壓迫的民族擺脫了民族的壓迫。

無產階級在解決其社會主義任務的同時，順便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沒有解決的任務，消滅了封建殘餘，因而滿足了農民歷來的渴望。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立刻就通過了土地法令，根據這個法令，土地私有制永遠廢除了。所有的土地被宣告為全民的財產，亦即意味着土地的國有化。地主、皇室與寺院的土地無任何代價地予以沒收，並無償地交給勞動者使用。由於這一法令的實施，農民們得到了一億五千多萬俄畝的地主土地。此外，他們不再向地主繳納地租，並免除了購買土地的費用，這兩項支出總數每年達七億餘金盧布。

一部分地主的土地變成了國營經濟——國營農場。大部分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使用並為他們進行了分配。同時，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俄曆六日）的法令，確定了各種以集體形式經營的經濟以及當時建立起來的共耕社、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

的優先權。正如以後的經驗所證明的，土地國有化對我國農業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由於共產黨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用剝奪地主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方法滿足了農民在經濟上極其迫切的需要，因而就從社會革命黨人的手裏把農民奪回來了。

由於蘇聯兄弟般的援助而擺脫了帝國主義羈絆的中歐與東南歐國家，也是用同樣方法把農民爭取到無產階級這一方面來的。在這些人民民主國家革命的第一階段，實行了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土地改革的結果，從地主手裏剝奪了大約有二千萬公頃的土地（佔這些國家領土的五分之一以上）。給農民們分配了一千四百萬公頃的耕地。

在中國也同樣實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中國的革命證明：在殖民地與附屬國，工農聯盟乃是打倒封建主義、擺脫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的手段，是反帝戰綫的基礎。大家都知道，中國革命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開始的。毛澤東同志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反帝與反封建）之間的最密切的聯系。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毛澤東寫道：“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因為帝國主義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為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農民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如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的隊伍而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①

正由於在中國建立了中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農民的聯盟，

①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81頁。

在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所造成的有利的外部條件下，中國的人民民主革命才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從而摧毀了帝國主義在亞洲殖民地統治的基礎。

在革命勝利之後，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立即宣佈了廢除封建的土地佔有制。到一九五三年春天，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結果有三億以上的中國農民分得了過去屬於地主階級的四千七百萬公頃的土地。農民免除了每年付給地主的相當於五千萬噸糧食價值的地租。

在人民民主國家裏，土地改革的特點是：在這裏，不同於當年蘇維埃俄國，不是把全部土地收歸國有，而是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作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共產黨和工人黨考慮到列寧的指示：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裏，新的政權將不能立刻廢除土地私有制，因為在那裏土地小私有制已存在了無數年代，如果把這種所有制予以廢除，則農民就會視作剝奪鄉村勞動人民的企圖。只有通過長期的農民經濟合作化過程，把它們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上去，才能創造條件，使全部土地變為公有財產的問題求得實際解決。

人民民主國家土地改革的一定的特點，並不妨礙其結果在主要方面和決定性的方面與蘇俄土地改革的結果相同。這些結果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消滅了封建關係的殘餘、消滅了地主階級，並把勞動農民羣衆爭取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

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佔有制，把土地和農具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其重要結果之一就是改變了農民的成分：減少了貧農的數量，增加了中農的比重。

在蘇俄由於分配了地主的地產，並在一九一八年下半年部分地剝奪了富農，就大大地增加了農村中中農的比重；中農成了農業的中心人物。無產者的下鄉工作和貧農委員會的成立，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勢力。這樣，並配合其他條件，就為爭取中農到蘇維埃政權這方面來創造了前提。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考慮到了革命勝利後所發生的階級力量配置的變化，對農民問題提出了新的口號。黨從中立中農的政策改變為與中農建立鞏固聯盟的政策。黨號召依靠貧農，與中農保持堅固聯盟，並進行反富農的鬥爭。

只有在建立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盟的條件下，才有可能鞏固住無產階級所奪取到的政權並運用它去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造。沒有這種聯盟，無產階級就不能保持住他所奪得的政權。這一點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與鞏固的最重要條件。

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命運，蘇維埃國家的前途，是決定於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首先是與中農的聯盟的建立和鞏固的。在國內戰爭的年代裏，這個聯盟是帶有軍事政治性質的，它所藉以支持的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在粉碎武裝干涉者與白衛分子鬥爭中的共同利害關係。與中農建立聯盟，對於國內戰爭以及與企圖在俄國復辟地主資產階級制度的國外武裝干涉者進行戰爭的勝利結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指出，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對中農所採取的路綫幫助蘇維埃政權戰勝了白衛分子並打退了外國武裝干涉者的攻擊，“一九一九年秋，當農民必須在蘇維埃政權和鄧尼金之間二者擇一的時候，農民擁護了蘇維埃，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戰勝了自己最危險

的敵人。”^①

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和平的經濟建設年代裏，共產黨在新的、經濟的基礎上鞏固了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新經濟政策的施行促成了這一點，新經濟政策考慮到農民對發展自己經濟的興趣和建立社會主義大工業與小商品農民經濟之間的結合的必要性。

爲了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就必須消滅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和實現小商品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列寧指出了解決這個任務的途徑。

列寧全面地證明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合作制是把千百萬勞動農民羣衆轉移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列寧所制定的合作社計劃規定要盡力發展能夠在新的技術基礎上重新武裝農業的社會主義工業；逐步地把中小農戶聯合到生產合作社裏去；以全力開展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並從商品流通中把資本主義因素排擠出去的方法，通過商品流通來建立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的經濟結合。

列寧的指示確定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無產階級國家經濟政策的原則，這個政策已使社會主義在蘇聯獲得了勝利，並且目前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也在爲建設社會主義而有效地運用着。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工人階級與農民是社會上兩個基本的階級；同時工人階級依靠着國家公有化的生產資料，首先是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而農民却依靠着小商

①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9頁。

品的個體農業。工人階級與農民在經濟地位上的這一差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兩個階級間一定的矛盾，而作為勞動者和小私有者的中農的兩面性就決定了他在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搖擺不定。

但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所涉及的是他們局部的和目前的利益，這種利益被他們根本利益的共同性所超過了。工人階級與農民都願意農業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而不願意它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為後者只能使大多數農民招致破產。正因為如此，農民按其自身地位雖非社會主義性質的却能夠也應該被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上來。從這一點出發，黨在自己的第十五次全蘇代表會議上強調指出，無產階級能夠也應該在經濟領域裏，在社會主義建設領域裏，成為大部分農民的領導者，正如它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中在政治領域內成為農民的領導者一樣。工人階級在經濟領域內對農民實現自己的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主要條件。

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建立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也是順利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條件，因而，也是創立與鞏固蘇維埃多民族國家的條件。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民族內部的工農聯盟，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代裏，在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的廢墟上所形成的新的、社會主義民族的階級基礎。同時這個聯盟也就成為各民族間友好合作的階級基礎。俄國工人階級不僅和俄國中央各省的勞動農民建立了聯盟，它同時把俄國邊疆地區過去被壓迫的民族也結合在自己的周圍，這些民族十分之九都是農民和小城市